

乾隆時期宮廷陳設類鈎窯瓷器初識

王光堯

由於乾隆皇帝的愛好與努力，乾隆時期的宮廷已成為包括鈎窯瓷器在內的古代藝術品集中收藏地與展示殿堂。從檔案記載和傳世實物對比來看，乾隆時期宮廷收藏的鈎窯瓷器既有盆、盆奩、尊和渣斗式花盆等學術界所說的陳設類或花器的鈎窯瓷器，也有碗、盤、罐、缸（註二）等日用鈎窯瓷器。在這些鈎窯瓷器中，由內務府工匠奉旨加刻詩文的鈎窯瓷器只有幾件碗和被乾隆皇帝錯認為柴窯的兩件枕，而在陳設類鈎窯瓷器上加刻的主要是宮殿名和地名，這和當時在官窯、汝窯、定窯和哥窯等古代名窯瓷器上加刻乾隆御製詩文的現象迥異，對此已有研究者進行思考。（註三）為在宮廷文化的大背景下進一步研究陳設類鈎窯瓷器，本文謹對清代宮中有關陳設類鈎窯瓷器藏存、使用和再加工的情況加以初步整理，以瞭解在該類鈎窯瓷器上加刻字的情況、動機及影響。

乾隆時期宮廷藏鈎窯瓷器概況

乾隆時期宮廷所藏鈎窯瓷器，據乾隆皇帝詩文所述有屬於日用類的鈎窯碗盤數百件（註三），但陳設類鈎窯瓷器的總數在文獻中則沒有明確提

及，我們只能通過乾隆時期檔案對陳設類鈎窯瓷器進行加工、加刻、修補等的相關記載加以推測，但這並不等於當時清宮對陳設類鈎窯瓷器的數量統計。

從檔案記載看，自雍正時期開始，屬陳設類鈎窯瓷器的各式花盆、盆奩、尊、渣斗一直不間斷地見於記載。但是，在雍正時期陳設類鈎窯瓷器被記錄的原因多是認看、修補、粘

補或改裝成盆景，關於這一點將另文論述，據這類記載無法統計宮中收藏的陳設類鈎窯瓷器的數量。到乾隆時期，情況的改變為我們今天的統計提供了可能。

乾隆初年，對陳設類鈎窯瓷器的認識和態度仍然沿襲著雍正時期的舊制，在認看、作為盆景、修補等活動外，增加了裝箱收存一項，如乾隆六年十一月下旨把鈎窯盆奩二十五件連同歐窯盆連七座，新磁鈎窯小盆連一件、鈎窯盆連一件一起覓一洋漆箱子盛裝保管。（註四）但從乾隆十一年開始，乾隆皇帝有意識地在陳設類鈎窯瓷器的盆、盆奩上加刻宮中殿名或陳設地名，並連續幾次補刻。相關記載如下：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均釉六方入角花盆二件、盆連二件，均釉盆連二件，養心殿西暖閣；均釉渣斗二件、盆連二件，均釉方花盆四件，均釉六方入角花盆一件、盆連一件，均釉盆連一件，養心殿東暖閣；均釉高椿花盆二件，均釉盆連二件，靜憩



月白釉出戟尊底部原刻數目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首領李玉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瀛台靜軒均釉古丁盆連二件，涵元殿均釉古丁盆連二件，夏玉攬金、均釉古丁盆連二件，澄懷堂均釉古丁盆連二件，香宸殿均釉古丁盆連二件，蘭室均釉

月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均釉海棠花盆二件、均釉六方八角花二件並竹石假山的盆連通共十二件俱刻得地名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于本年八月二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各式盆連三十四件持進，交首領王明貴訖。」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首領李玉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瀛台靜軒均釉古丁盆連二件，涵元殿均釉古



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底部原刻數目字和後刻殿名地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下令刻字的陳設類鈎窰瓷器盆和盆奩共八十七件。所刻殿室地名有養心殿西暖閣、養心殿東暖閣、靜憩軒、漱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首領李玉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瀛台靜軒均釉古丁盆連二件，涵元殿均釉古

這次請示得到的旨意是「將大地名准刻橫的、小地名准刻豎的」。從實物看，陳設類鈎窰瓷器底部刻寫的殿名地名均是殿名即「大地名」在上自右向左橫刻、具體擺放瓷器處的地名即「小地名」在下豎刻。看來，這種佈局是乾隆皇帝設計或者是得到乾隆皇帝認可的方案。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下令刻字的陳設類鈎窰瓷器盆和盆奩共八十七件。所刻殿室地名有養心殿西暖閣、養心殿東暖閣、靜憩軒、漱

古丁盆連二件，虛舟均釉六方八角盆連二件，傳旨：著俱刻地名，得時呈覽過交瀛台，欽此。于本年六月初三日，副領催楊四將均釉盆連十四件持赴瀛台，交首領李玉訖。」（《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三）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雖然對

三批陳設類鈎窰瓷器下達了刻字的詔

命，但完成任務的時間卻不一。刻字

的詔令下達後，先設計出擬刻的「地

名字名樣」黏貼在盆底，送乾隆皇帝

過目，和其他質地的宮廷藝術品的生

產一樣，也有一個制樣呈覽的過程，

這次請示得到的旨意是「將大地名准

刻橫的、小地名准刻豎的」。從實物

看，陳設類鈎窰瓷器底部刻寫的殿名

地名均是殿名即「大地名」在上自右

向左橫刻、具體擺放瓷器處的地名即

「小地名」在下豎刻。看來，這種佈

局是乾隆皇帝設計或者是得到乾隆皇

帝認可的方案。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下令

刻字的陳設類鈎窰瓷器盆和盆奩共

八十七件。所刻殿室地名有養心殿西

暖閣、養心殿東暖閣、靜憩軒、漱



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軒；均釉海棠盆連二件，漱芳齋；傳旨：俱各刻地名，欽此。于本月二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均釉盆連一件盆底貼得地名字

名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大地名准刻橫的、小地名准刻豎的，欽此。于本年八月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均釉方花

盆四件、均釉盆連一件、均釉海棠盆連二件俱刻得地名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于本年八月二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各式盆二十二件俱旋得地名持進，交首領王明貴訖。」

乾隆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司

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均釉渣斗

一件、盆連一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

二件、盆連二件，均釉渣斗二件、盆

連二件，均釉菱花花盆一件、盆連一

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一件、盆連一

件，均釉菱花花盆一件、盆連一件，

均釉六角花盆二件、盆連二件，均釉

海棠花盆二件、盆連二件，均釉海棠

花盆一件、盆連一件，均釉六方八角

花盆一件、盆連一件，均釉高椿花盆

一件、盆連一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

二件，均釉海棠花盆二件，均釉六方

八角花盆二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

件，均釉六方八角花盆二件，均釉長

方花盆一件，均釉海棠盆連一件，均

釉六角盆連一件，均釉六方八角盆連

大小二件，均釉菱花盆連大小二件，

均釉鼓丁盆連大（大）小三件，傳

旨：著俱各刻地名，欽此。於本年八

芳齋、瀛台靜憩軒、涵元殿、夏玉

攬金、澄懷堂、香宸殿、蘭室、虛舟

共十一處。據初步統計，在傳世陳設

類鈎窰瓷器上加刻的清代宮殿、地名

字有「瀛台澄懷堂用」、「瀛台虛舟

用」、「瀛台涵元殿用」、「瀛台香

辰殿用」、「瀛台靜憩軒用」、「養

心殿東暖閣樓下用」、「養心殿明窗

用」、「養心殿長春書屋用」、「養

心殿隨安室用」、「重華宮金昭玉翠

用」、「重華宮芝蘭室用」、「重華

宮漱芳齋用」、「建福宮竹石假山

用」、「建福宮敬勝齋樓下用」、

「建福宮凝暉堂用」，主要集中在瀛

台、養心殿、重華宮、建福宮四大建

築區內，其具體使用地點遠比上述見

於檔案的十一處要多且細，這除了說

明檔案所記僅具殿名之舉要者外，

在殿名地名外還應該刻有其他內容。

到乾隆十一年八月，又有交出

陳設類鈎窰瓷器命刻地名的記載：

「初三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

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均釉菱花盆

連二件，傳旨：著查從前交出盆連

之內，有照此一樣的系列何處地名，



天青釉鼓釘三足花盆 底部原刻和後刻數目字和後刻殿名地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天青釉鼓釘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字爲盆奩刻字，說明盆上已有刻字，則新納入刻字體系的最多只有七件。至此，宮中收藏的陳設類鈎窯瓷器當不少於一百零二件。

由於乾隆二十一年的刻字活動檔案並沒有明載是刻加宮殿地名，同樣從檔案記載可知，當時在鈎窯盆或盆奩上加刻的字並不全是清宮內的宮殿地名，所以這一統計或有誤差。同樣要說明的是我們的統計只是基於對檔案相對完全的梳理，並不能做到絕對

亦將此盆連照樣刻地名，欽此。於本月二十八日，將均釉菱花盆連二件刻得字交首領王明貴訖。」八月「初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均釉長方八角花盆連二件，傳旨：著查從前交出盆連之內，有照此一樣的系列何處地名，亦將此盆連照樣刻地名，欽此。于本月初十日，太監常生將均釉長方八角盆連二件刻得字交太監胡世傑訖。」（《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三）八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均釉長方盆連四件，傳旨：著查何處少盆連即刻何處地名，欽此。於本月二十八日，將均釉長方盆連四件刻得字交首領王明貴收訖。」（《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三）從記載看，這三天（次）交出的八件鈎窯盆、盆奩，明顯和正月二十三日交出的並非同一批或重複的器物，至此被乾隆皇帝納入刻寫殿室地名的陳設類鈎窯瓷器至少已有八十五件，器類有各式的盆、盆奩、尊、渣斗。

然而，在鈎窯花盆和盆奩上加刻殿室地名的活動並沒有停止，乾隆二十一年的檔案又有相關的記載：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容世泰交均窯盆連二分計四件，傳旨將盆連照花盆上一樣，著李世金刻字，欽此。于九月十九日，員外郎郎正培將均窯盆連二分刻得字，交太監張進忠持去，訖。」（註五）「十一日，太監王朝還來說太監張九交均窯盆連二件，傳旨著刻字，欽此。于本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均窯盆連二件上貼得樣式籤子，持進交太監張永泰呈覽。奉旨：照樣准刻字，欽此。于九月十一日，員外郎郎正培將刻得字均窯盆連二件，交太監劉仁貴持去，訖。」「十二日，首領陳永德來說太監張九交均窯盆連二件，傳旨著刻字，欽此。于本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均窯盆連二件上貼得樣式籤子，持進交太監張永泰呈覽。奉旨：照樣准刻字，欽此。于九月二十一日，員外郎郎正培將鈎窯盆連二件刻得字，交太監王有法持去，訖。」（《清宮造辦處各件活計檔》第二十一冊；《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四）由於這兩天的刻字中，有一例是照盆上的

的正確，但值得信從的是已可以從中找出規律性的認識。

陳設類鈎窯瓷器上的另類刻字及刻字人

乾隆時期除了在陳設類鈎窯瓷器加刻殿名和地名外，還在盆或盆奩底部模仿陳設類鈎窯瓷器舊有數字樣加刻或改刻數位的，這一點是以數字爲據進行統計研究時應加以考慮。在以往研究中已有人注意到陳設類鈎窯瓷器底部的數目字有印與刻的不同（註六），但乾隆時期的改刻、加刻和磨掉字的行爲則是以往研究者並不知道的內容，所以相關的論述視這類刻字爲「燒後補刻的數目字」並把它們和印在胎上的數目字視爲同樣性質的內容。（註七）

見於檔案，乾隆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來說總管劉滄洲交均釉盆連二件，內一件破，傳旨：將破盆連粘好，其整盆連著刻一六字，欽此。于十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將均釉盆連二件內一件粘好、一件刻得六字持進交訖」（《清宮瓷器檔案

全集》卷三）。此次刻「六」字原因如何？是比照已知盆奩中大小相同者刻有六字，還是另有他因已不得而知。但是下面的檔案記載改刻數目字之舉則頗有啓示作用。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首領胡進忠來說太監如意交均窯花盆一件、均窯盆連一件、楠木單油牌子三十根隨等次號數單一件，傳旨著將花盆上二字改三字、盆連上舊字磨去亦改添三字，……欽此。于九月初八日，首領胡進忠將改做得鈎窯盆連二件、楠木牌子三十根持去，訖。」（《清宮造辦處各件活計檔》第二十一冊；《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四）在已統計到的一百六十三件陳設類鈎窯瓷器中，帶三字的鈎窯洗、尊、盆、盆奩共有十七件（註八），從中尋找造型相符且釉色相近同時可以組成盆與盆奩組合的配套，應該可以找到這次改刻活動遺留的痕跡。

加刻和改刻同樣的數目字，顯然是爲了陳設在一起時相配套用，此舉說明，在乾隆時期的宮廷內，以乾隆爲代表的知識份子群已注意到陳設類

